畲族

一、概況

畲族自稱“山哈”或“山達”(即客人的意思)，約23萬多人，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五省六十多個縣市的部分山區，以福建、浙江兩省人口為最多。福建省有12萬多人，主要分佈在福安專區的福安、寧德、霞浦、福鼎、羅源、連江等九個縣；浙江省有10萬多人，主要分佈在溫州、金華兩專區的十多個縣內；分佈在江西東部鉛山、貴溪兩縣和南部興國縣的有2000多人；廣東省有1500多人，分佈在潮安、海豐、大埔、增城、惠陽、博羅等縣；安徽省寧國縣有500多人。

由於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畲族分佈非常零散，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一般都以幾十戶的村落為聚居點，四周圍繞著漢族村莊，有的則和漢族雜居在一起。

畲族的語言屬漢藏語系。各地畲族語言基本上接近漢語的客家方言，但在廣東地區的極少數畲族還使用著接近於苗瑤語族苗語支的語言。畲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漢文。

畲族分佈的地區屬東南丘陵地帶，境內到處蒼山環繞。畲族比較集中的閩東地區，有太姥、鷲嶺兩個山脈伸延開來，遍佈全境。蟠結橫亙在浙南境內的主要是括蒼山脈的南延和洞宮諸山。在粵東境內有鳳凰、羅浮、蓮花三個山區。畲族居住的山區都沒有較大的河流，但到處溪流迴繞，溪水奔流出谷，短而急湍，可用作水力資源。

氣候大部分屬於副熱帶，溫暖濕潤。山區冬季較寒冷，但霜期很短。一般全年氣溫約在攝氏15度左右。雨量充沛，全年雨量約在1500公厘以上，宜於農作物生長。農產品以稻穀、番薯、大麥、小麥、油菜、豆類等為主。廣大的山區是我國重要的林區之一，高山之上到處覆蓋著茂密的森林，就像一片深綠色的海洋。木材積蓄量很

大，樹木種類約在千種以上，其中以松、杉為最多。此外山區又盛產多種土特產、名貴的藥材。福建畲族地區的茶葉，在國內外市場上都享有聲譽。礦產也十分豐富，有煤、鐵、金、銅以及其它多種有色金屬，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珍貴財富。

畲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根據史載，早在公元七世紀就已居住在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當時被稱為"蠻僚"[1]，十三世紀中葉的漢文史書上稱之為"畲人"或"畬民"[2]。十四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畲族逐漸由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向閩中、閩北、閩東、浙南、贛東等地遷移，形成了今日畲族分佈情況。

歷史上畲、漢兩族人民早就有了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和友好交往。宋代，畲族已處於封建社會階段，畲、漢兩族人民長期交往和雜居的結果，是社會經濟逐漸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1840年鴉片戰爭後，畲族與全國人民一樣由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一步一步地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由於畲族地區處於東南沿海，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較早，因此經濟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也較深。

畲族人民富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在歷史上，畲族人民為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榨，常和漢族人民聯合一起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規模較大的如宋末元初以陳吊眼和畲族婦女許夫人為首的福建畲、漢兩族人民聯合反元的鬥爭，參加人數多達十數萬，在宋亡之後仍然堅持了三年之久。近代，在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畲族人民曾積極響應太平天國起義。浙江、閩東的畲族積極支持與參加了浙南的"金錢會"起義。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如反洋教運動)中，畲族人民也充分表現了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

近三十年來畲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東畲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與漢族人民一道掀起了武裝鬥爭，建立了革命政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

爭時期，閩東、浙南等畲族地區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些地區大都成為光榮的革命老根據地。廣大畲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組織了農會、婦女會、兒童團，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並且配合紅軍打擊了反動派。在紅軍北上抗日後的艱難歲月裏，畲族人民仍然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了鬥爭，巧妙地掩護了革命同志，保存了黨的力量，保持了黨的光榮旗幟。在全國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中，畲族人民曾組織游擊隊配合人民解放軍徹底地推翻了三大敵人的反動統治；在解放初期又配合人民解放軍在深山叢林中，進行剿匪鬥爭；現在，沿海的畲族人民以百倍的警惕守衛著祖國的東南海防，更以各種實際行動，為支援解放台灣而鬥爭。

二、解放前的社會面貌

1、經濟狀況

畲族人民主要從事農業。他們住居在山腰地帶，可耕面積少，多倚山坡築梯田。梯田分水田和旱田兩種，水田面積居多，種植水稻，旱田栽植番薯。此外還種植少量的大麥、小麥、豆類和花生、油菜、煙葉等經濟作物。生產工具有犁、耙、鋤頭、山鋤、鏟、鐮刀、田刀、柴刀等，鐵製農具都由漢區輸入，或僱漢族匠人製造。耕作過程中使用畜力較少，其原因除了畲族農民貧困，無力購買耕牛外，還由於部分梯田坡度較大，田坵狹窄，不便使用犁耙。耕作技術和漢區大致相同，但由於畲族山區山高水冷，播種期比平原地區稍遲。在封建制度下，畲族人民無力改良自然條件和防範風、獸等自然災害的侵襲，農作物產量不高。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反動政府曾強迫和誘騙畲、漢族農民用大量土地種植鴉片，因而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畲族農村中土地佔有極不合理。根據福建福安、霞浦、福鼎三縣的28個村701戶的調查，僅佔總戶數0.44%的漢、畲地主佔有土地

33.5%；而佔總數70.92%的貧僱農僅佔有土地21%；佔總戶數25.54%的中農佔有土地37%；其餘為富農所佔有。而且地主、富農的土地大多是較大塊的上中水田，貧僱農民的多是山坡上貧瘠的旱地。土地兼併的加劇，使畲族地區的中農數目也在不斷下降，貧僱農數目日漸增多，如上述28個村子的179戶中農中，佃中農就有75戶，佔42%，他們逐漸喪失了生產資料，成為被剝削者。封建剝削極為殘酷，地租剝削中定租制比較盛行，租額一般佔收穫量的50—70%左右，有的高達80%以上。分租制有對半分、四六分(佃戶四成)、三七分(佃戶三成)等幾種。不管年成好壞，租額不變，而當年成好時地主往往又藉口加租。地主還用大秤收租、以款折租時加收運費和押租制等狡猾手段盤剝農民，並規定收租時佃戶要籌辦"山租酒"和"吃租飯"、"送禮"等名目，進行勒索。此外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更以貸穀、買青苗等高利貸形式，採取"驢打滾"的付息辦法，使農民終身負債，陷於赤貧。畲族農民因此而被迫出賣勞動力，給地主當長工、短工，過著牛馬般的生活，一般長工常年所創造的價值約有70%以上被僱主剝削去。封建剝削的結果正如畲族農民中流行的諺語所說："種田得稻草，養活了地主，餓死了自家人。"

手工業生產在畲族地區不甚發達，種類也不多，一般有縫紉、竹編、泥工、木工、刺繡等。個別地區也有小規模合夥經營的造紙、燒磚等手工業生產。生產技術是從漢族地區學來的，還沒有脫離農業生產的手工業工人。手工業還只是作為附屬於農業的副業生產。

畲族人民一般都要到數里或數十里外的畲、漢兩族同一市場去進行交易。他們把山區的土特產如茶葉、毛竹、柴片、木炭、家禽、蜂蜜等帶到市場上去出售，買回生產工具、鹽、米、洋油、洋布、火柴和宗教用品等。此外，近百年來，隨著畲族人民的經濟生活逐漸地和市場發生了緊密的聯繫，山區的土特產愈來愈多地商品化，使畲族地區的自然經濟日漸破壞了。

2、政治狀況

解放前，畲族人民在政治上處於極端無權和被歧視的地位。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為了加強統治，鎮壓和監視革命活動，在畲族地區普遍推行了“保甲制度”，實行法西斯的統治政策。反動政府起用了不少畲、漢兩族的地主、富農及國民黨黨徒充任偽保甲長，對畲、漢族人民攤捐派款、抓丁拉伕。國民黨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有保甲費、保衛團團捐、警備班費、自治費、壯丁費、草鞋捐、房捐、月捐、門牌稅、鴉片捐、鐵路費、人頭稅等。抗日戰爭前夕，福建各縣捐稅竟達五、六百種以上。反動保甲長往往以抽丁為名，對人民百般勒索，無所不為，逢年過節還強迫農民送禮和交壓歲捐。隨著國民黨政治日趨腐敗，捐稅逐年增加，抓丁派款急如星火。福建霞浦縣南塘畲族村每戶每年平均派款達一千斤稻穀。浙江麗水縣白弦下畲族村33個青年中被抓丁的就有23人。許多畲族農民為了逃避抓丁，忍痛把自己的身體弄成殘廢，更多的人被迫逃亡。

配合保甲制度壓迫畲族人民的還有地主階級的武裝及反動會道門組織，地主糾集地痞流氓、組織民團，和反動軍隊一起鎮壓革命，成為國民黨的忠實爪牙。反動會道門如大刀會等也是地主階級搜羅一些反動分子組織起來的，利用迷信到處招搖撞騙，從事特務活動，殘害進步青年和革命同志，使整個社會籠罩著恐怖氣氛。國民黨反動派更繼承了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衣缽，對畲族人民實行民族壓迫和歧視。畲族人民根本得不到平等待遇，處於水深火熱的痛苦深淵中，渴望獲得解放。

3、生活與文化

解放前畲族人民的生活極其悲慘，許多貧苦農民每年缺糧都在六至八個月以上，只好用米糠、野菜充飢。廣大的畲族人民整年辛苦也吃不到幾頓白米飯，過著“七分野菜，三分番薯絲”的生活。貧苦農民居住在低矮陰暗的茅屋和以竹片當瓦的房屋中，很少人能住得起瓦

房。在嚴寒的冬天只穿著襤褸不堪的破衣，懷抱火籠取暖，蓋稻草、棕衣過夜。許多人被迫出賣妻兒，遠離鄉土，在外地乞討，有的則在飢寒交迫中病死或凍餓而死。畲族人民中普遍流傳著“蠟燭彎彎倒，火籠當棉襖，辣椒當油炒，番薯絲吃到老”的歌謠，正是當時畲族人民辛酸痛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解放前畲族人民絕少享受到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絕大多數是文盲。醫藥衛生條件很差，疾病流行猖獗，常見的疾病有瘧疾、梅毒、霍亂、血絲蟲等十多種，造成了畲族人民很大的死亡，嚴重地影響到本民族人口的增長。

廣大的畲族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了優秀的文化藝術。他們喜歡唱山歌。山歌多是民間的口頭文學，古代口口相傳下來，並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內容有追述本民族來源和遷移經過的“高皇歌”和“麟豹王歌”；有富有藝術魅力、歌頌勞動和愛情的“雜歌”；有取材於漢族民間神話和故事傳說改編而成的“白蛇傳”、“梁祝”等小說歌。在階級社會中，畲族人民用山歌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揭露反動統治的罪惡和黑暗，歌頌人民的反抗鬥爭，如“明朝十八帝”、“災荒歌”等。唱歌是畲族人民最喜愛的一種文化活動，他們不但在待客、婚慶或各種節日中唱歌，即在日常生活中，在山間勞動時，也常以歌當話，互相對答。每年還定期舉行盛大的“盤詩會”。畲族山歌中所特有的二聲重唱，畲族人民叫它做“雙條落”，豐富了我國的民間音樂。

畲族的民間工藝美術，主要表現在服飾和手工藝品的製作方面，在衣裙上刺繡著各種花鳥以及幾何紋樣，形成一種美麗的圖案花紋。其他如腰帶、斗笠，也是一種較有特色的民間工藝品，編織的功夫很精巧。

畲族婦女的服飾較有特色，又因地而異。福建畲族的婦女多穿黑、藍兩色的苧麻布，衣領、右襟和袖口鑲百色花邊，有些地區的畲

族婦女不分季節都穿短褲，裹綁腿和打赤腳。腰間並束有彩色條帶和圍腰。婦女一般都把頭髮梳成螺式或截筒高帽式盤在頭上，髮間環束紅色絨線，插有銀簪或豪豬針，已婚與未婚婦女的髮式亦有區別。

畲族人民的婚喪習俗和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與當地漢族大致相同。本民族特有的節日有三月三日染烏飯祭祀祖先、十月祭"多貝大王"等。部分地區在節日還有不少禁忌，如二月十九觀音生日忌挑糞，三月三日不下田等，這些禁忌常妨礙了正當的生產活動。

解放前畲族迷信鬼神，崇拜祖先。在民間家喻戶曉地流行著傳說中的畲族祖先盤瓠的故事。並把盤瓠傳說繪成畫象(稱祖圖)祀奉甚虔，每隔三年，舉族大祭一次。這種傳說和崇拜可能是原始公社圖騰信仰的殘餘。

三、解放後畲族的新面貌

1、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勝利

隨著全國的解放，畲族地區在迅速推翻國民黨黑暗統治後，即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權。畲族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和管理國家政權的權利。政府機關中畲族代表和委員的名額都大大地超過它的人口比例。如1952年福建福安專區畲族佔全區總人口的7%左右，但卻有省代表3名、縣代表80名、縣政府委員10名。1958年普選中，福安專區六縣畲族人口佔總人口的5.8%，而當選的畲族代表，就佔了7.5%。

黨和政府為了更好地發展畲族人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更好地實現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利，曾先後於1958年在福建福安縣仙嶺洋建立了相當於鄉一級政權的畲族自治區人民政府；1954年在江西鉛山、貴溪兩縣畲族聚居地區成立了三個相當於鄉的畲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到1957-58年間在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畲族聚居的地

方為基礎，包括了一部分漢族，成立了57個民族鄉，已建立民族鄉的畲族人口佔全國畲族總人口的21.8%。歷年來黨和政府還採取了各項具體措施大力培養畲族幹部，積極發展畲族黨團員。每年都選送畲族子弟和幹部到民族學院或各種訓練班學習，福建、浙江兩省的畲族幹部1958年比1949年增加了9倍多。福建省畲族黨員1958年比1949年增加了近72倍，團員的數目也增長得很快。此外，黨和政府還通過每年舉行的畲族代表會議和民族工作座談會，聽取畲族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組織畲族代表參觀團到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觀禮，或到祖國各地參觀各項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使畲族人民體會到黨的無限關懷和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互相瞭解，增加了畲族人民對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信心。

解放後，黨在領導畲族人民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保衛祖國海防鬥爭的同時，又領導畲族人民進行了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並在1952年取得了完全勝利，摧毀了封建勢力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廣大畲族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後，黨領導畲族人民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同樣經歷了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三個步驟。隨著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合作社的規模逐漸擴大，於是在更大範圍內把畲漢兩族成員組織起來，畲、漢兩族在同一合作社內的現象十分普遍。福建福安專區畲族1957年5月共組織了312個合作社，其中畲漢民族聯合社就有158個。畲漢兩族人民在同一社內共同參加了合作社的管理工作，集體勞動，互相幫助，親如一家，民族間的友好關係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通過1955年下半年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至1956年底，浙江省9萬多個畲族農民已有90%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福建省有85%的農戶入了社。畲族地區基本上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畲族地區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1957年又同樣取得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

利。廣大畲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用事實駁倒了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對黨的合作社、統購統銷等政策的污衊，打擊了階級敵人的活動。特別是批判了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誣衊黨的民族政策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謬論，搞臭了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畲族人民的政治覺悟更加提高了。這一切都為1958年全面大躍進打下了穩固的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

1958年，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畲族地區和全國各地一樣實現了各項事業的全面大躍進，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蓬勃開展，並於同年下半年迅速地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使畲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面貌。

2、各項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

畲族地區經過了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生產關係的變革，有力地推動了各項經濟事業的發展。

在農業方面，解放後畲族人民就積極開墾荒地，改進生產技術，改革生產工具，改造自然，戰勝災害。福建畲族人民解放後共開墾七萬畝荒地，佔總耕地面積十七萬畝的41.2%。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福建福安專區擴大灌溉面積295000畝，改善灌溉面積達471000畝，防洪治澇面積達17萬畝。羅源縣八井畲族鄉由於解放後整修水利的結果，使全鄉受益面積佔全鄉總耕地面積的70%左右。水利工程的普遍興修，改變了畲族山區“十年九旱”的面貌。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在黨的領導下畲族人民興起一個“戰勝窮山惡水，改變山村面貌”的興修水利高潮，大興水利工程，水利灌溉面積普遍擴大了，大大地增加了抗旱的能力。不少公社在1959年已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排灌系統，根治了常年發生的災害。積肥運動中，畲族人民提出了“向海洋進攻，向山林進攻，向陳垣斷壁進攻”的口號，使農田施肥量較以往幾倍、幾十倍地增加了。在全面貫徹農業“八字憲法”的具體措施中，

各地在興修水利的基礎上進行了合理排水灌溉，改串灌為輪灌[3]，選種育苗，改單季稻為雙季稻以及改良土壤等工作。普遍推廣了合理密植。新式農具如直播機、插秧船、打穀機、播茶機、切薯機、噴霧器、耘禾器、劃行器等也逐步推廣使用。大躍進中畲族人民又積極動腦筋、找竅門，創造和改製了各種新式農具和進行了工具改革，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生產效率。到1960年春，畲族地區和全國各地一樣開展了"人人革新，個個獻計"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並取得了一定成效，解決了勞動力緊張的問題。農業生產發展，糧食產量逐年提高，福建畲族地區糧食平均畝產量1947年為184斤，到1950年為286斤，大躍進的1958年已增長為平均畝產671斤，接近《全國農業發展綱要》40條的要求指標。

林業、副業與各種經濟作物也獲得了全面發展，大躍進以來各地組織了專業隊從事各種經營。福建畲族地區的茶園1957年比1949年擴大67%。1957年到1958年茶葉生產增長了80%。造林面積由1952年到1957年增加了三倍多，1958年又比1957年增長了74.5%。浙江麗水縣碧湖公社聯濟小隊1958年油茶畝產達200斤，突破全縣最高紀錄，1958年全國油茶現場會議就在這裏召開。大辦多種經營使收入增加了，1959年10月底福安專區在茶葉、木材、畜牧業、副業等方面的收入比1958年又增長30%以上。

大躍進的1958年，畲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白手起家大辦工業，從而結束了畲族過去"手無寸鐵"的歷史。畲族地區初步建立了煉鐵、農具、化肥、造紙、磚瓦、林產、化工及農業產品加工等工廠。在各省專區的冶煉、機械、燃料、電機等工廠中也出現了一批畲族工人。

畲族地區已初步改變了過去在交通、郵電、商業貿易方面的落後面貌。閩、浙兩省畲族居住的山區解放前根本沒有公路，現在已實現了縣縣通公路、鄉鄉通大道。鷹廈鐵路是第一條通過畲族山區的鐵路。畲族居住的縣、區、鄉、村都設立了郵電局、郵電所、代辦所。

1958年福安專區通郵電里程達14241公里，比1950年增長5.7倍，電話線路增長9.3倍。不少畲族鄉還建立了水電站，裝上了電燈、廣播筒和電話機。為適應畲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國家商業網也深入畲村，國營商店、供銷社、收購站逐年增加，購銷額逐年增長，促進了畲族山區的經濟繁榮。

黨和政府十分關切畲族人民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解放後抽調了大批漢族幹部到畲族地區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並且每年都撥出一定的少數民族教育補助費。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福建省撥給少數民族的教育補助費共152000元，浙江省1956年用於民族小學的補助費有13056元，其中學生補助費佔69.18%，因而促進了畲族教育事業的發展。浙江省麗水縣1952年創辦一所少數民族師範學校， 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師資，1957年全省有民族小學64所。福建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全省有畲族小學108所，學生4964人；1958年比1957年增加143.5%，學生人數增加186.8%。並於同年在畲族人口聚居的福安專區建立民族中學一所。學校教育堅定地貫徹了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開展了勤工儉學活動，教學質量提高了。此外各地還創辦了業餘中學、小學掃盲班、幼兒班。在廣大畲族青年中進行了掃盲，使不少的畲族青年擺脫了文盲，開始能讀報、寫信，有的還當上了農業社會計。他們感激地說：“共產黨來了，畲族人民的眼睛也亮了”。1958年大躍進中畲族地區為生產服務的科學研究活動也逐漸開展起來。

在群眾文化活動方面，畲族地區普遍建立了文化站、農村俱樂部和業餘劇團等。政府還經常組織幻燈隊、電影放映隊深入畲村，進行宣傳教育活動，豐富了畲族人民的文化生活。福建畲族群眾反映說：“過去山村冷清清，如今變成福州城(福建省會)”。

文學藝術方面，在黨的親切關懷與幫助下，失傳已久的畲族民間舞蹈被發掘和整理出來。如“婚禮舞”、“採茶舞”、“龍傘舞”、“畲

民歡樂舞”等，“婚禮舞”還被拍成了電影。畲族人民固有的優良傳統的文藝形式得到了充分的發揚，並且增加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內容。山歌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了，許多民間歌手運用傳統的長篇敘事歌的形式編出了許多“解放歌”，追憶過去受壓迫、剝削的苦難歲月；用無限的激情熱情奔放地歌頌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們唱道：

我們領袖毛主席，他比太陽還光明；

太陽只把白天照，他把黑夜都照明。

太陽出山四處花，黨的恩情比天大；

東南西北歌聲起，一輪紅日照畲家。

解放後社會改革和生產鬥爭的熱烈場面更是新山歌的主要題材。1958年大躍進的大煉鋼鐵運動中，畲族婦女用山歌表達了自己的勞動熱情：

畲家婦女守爐邊，盤答山歌千萬篇；

唱到鐵水流成海，唱到鋼花飛滿天。

解放後黨和政府大力採取措施改善畲族地區的衛生條件和人民健康狀況。一方面普遍開展了愛國衛生運動；另一方面撥給了大量的衛生醫療補助費。畲族地區醫療機構普遍設立了，培養出一批本民族的醫護人員，醫療隊也常常深入畲村巡迴醫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福建省撥給少數民族的衛生醫療補助費達87700元，享受醫療費減免的719人次。1959年福建、浙江兩省有畲族醫務人員(醫師、保健員、接生員)共251人。隨著畲族地區各項衛生事業的發展，畲族人民的體質增強了，過去最為嚴重的普遍流行的梅毒、血絲蟲等主要疾病基本上消滅了。新法接生普遍推廣，大大減低了嬰兒的死亡率，人口迅速增加了。1956年福建福安縣畲族新生嬰兒死亡率下降到5.8%；從1949年到1957年福建畲族人口平均每年增長1.95%。

3、物質生活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變化

隨著生產的發展，畲族人民根本擺脫了過去窮困的面貌，物質生活逐年提高了。很多畲族農戶新蓋了明亮的瓦房，糧食不僅夠消費，而且還有餘糧出售給國家，現金收入增加了，社會購買力也隨之提高。如浙江景寧縣的商品零售總額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比1952年增長11倍半，比1949年增長99倍。畲族人民不僅有了棉被蓋，而且有了成套的衣服，夏天穿單衣，冬天穿棉衣或毛絨衣。婦女們穿上了鮮艷美麗的花衣服，過去終年赤腳或穿草鞋，現在也穿上了球鞋或皮鞋。其它日用百貨、消費品也隨著生產的發展逐年增加。

人民公社化後，農村建立了公共食堂，畲族人民擺脫了過去“一日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菜”的糾纏，安心投入生產，並且可以按期領到自己的工資。畲族農村中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俱樂部、醫療衛生機構等集體福利事業的興辦，使畲族婦女擺脫了做飯、洗衣、帶孩子等繁瑣的家務勞動，走出了家庭小圈子，投入熱火朝天的生產戰線，她們說：“公社千斤擔，婦女挑一半”。現在畲族農村中已出現了“人人有事做，戶戶無閒人，個個勁頭大，男女老幼喜洋洋”的新氣象。

解放後幾年中，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畲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的社會風尚正在樹立，許多不利於生產、不利於民族發展、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陳規陋習被群眾自覺地革除了。如畲族婦女過去的髮式梳妝要花費很多時間，在大躍進中婦女們感到梳頭佔用過多的時間影響了生產，有的自動改梳成辮子，或剪成短髮。一些不利於生產的禁忌如每月初一、十五“菩薩”生日忌挑糞；三月初三不下田，怕斷絕水源；“封龍日”不使用鐵器，怕引起旱災等，都逐漸革除了。過去青年男女常為盤答山歌而通宵不眠，影響了生產勞動，現在代之而來的是田頭、爐邊、炭窯旁的山歌對唱。

人民公社化後，畲、漢民族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公社把

兩族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個大家庭內，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互相幫助。如浙江麗水縣紅星公社吳寶崗的67戶畲族，為適應大生產的需要，搬到漢族村子裏居住，受到了漢族社員的熱烈歡迎，騰出房子給畲族住，並幫助畲族社員蓋新房，這個原來只有16戶的漢族村，變成了83戶畲、漢兩族社員共同生活的樂園了。在共同的勞動中，畲、漢兩族社員互教互學、互相傳授生產技術。有傳統勞動習慣的畲族婦女主動地幫助漢族婦女掌握了耕作技術，她們互相熱烈地稱呼對方為"勞動嫂"。許多漢族社員學會唱畲族山歌，跳畲族舞蹈。畲、漢兩族間的通婚也更加普遍。

人民公社化後，畲族地區各方面的變化是極其迅速而驚人的。目前，畲族地區真是"東風遍山區，紅花處處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思想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深入人心。畲族人民正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堅定不移地沿著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旗幟，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上，飛躍前進！

註釋：

❶ *民國《雲霄廳志》卷十一，唐宦績。*
❷ *南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諭畲記。文天祥：《文山全集》卷十一，知潮州寺丞東岩先生洪公行狀。*
❸ *山區梯田過去用串灌，從高處的田逐級往下灌，肥料隨水流失，輪灌用水渠灌溉。*

（與施聯朱、白濱合作，刊於《中國少數民族簡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1960年版。囿於當時的環境，文中不少數字有嚴重失實之處，特誌於此）